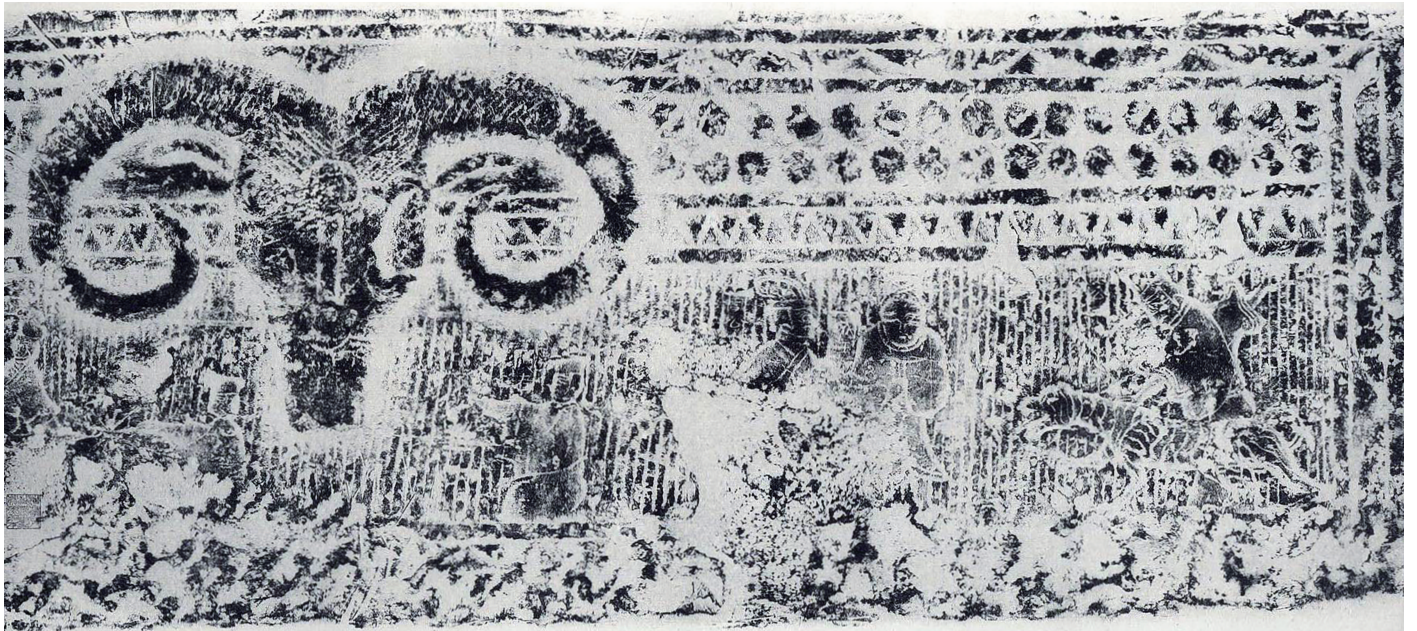


# 漢畫像中的另一個周公故事

## —南宮氏伐虎方—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院士

古今論衡 第 42 期 2024.6

長久以來，為解讀漢代墓葬中畫像石和壁畫的寓意，我曾設想了各種情況和因應的解讀方法，試圖證明從畫像原榜題和畫面佈局的格套切入是較好的途徑。此外也曾利用文獻去解讀一些沒有榜題又和既存格套不合的畫像，例如「秦王謀刺燕太子丹」。<sup>①</sup>

事實上就算有榜題，卻仍然無法解讀的畫像不在少數。其中有些曾引起討論和爭議，有些則乏人理會，甚至幾乎為人遺忘。這篇小文要談的正是一方有榜題，著錄已久，原石俱在的周公畫像。或許因為畫面幾乎沒有其它畫像和相關的傳世文獻可以參照，榜題又遭質疑，迄今不見有中外學者解讀其故事。

## 一、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沂州畫像石

原出山東沂州，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的一方畫像石，是由羅振玉捐贈。<sup>②</sup> 捐贈時間應在 1901 年年底以前，東洋館入藏的確切時間則不明。<sup>③</sup> 原出沂州之說可能來自古董商。傅惜華《漢代畫象全集》二編（圖 214）也說沂州畫像出自「山東省臨沂縣（今臨沂市）附近，地方不詳；出土後，歸上虞羅振玉，今藏於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因非經科學發掘，明確的出土地點已不可知，本文為稱述方便，姑且仍名之為沂州畫像石。1992 年我到東京得見原物，2007、2009 年再訪，攝得較好照片（圖 1-2.3）。

照片在手卻苦於不知如何解讀。幾年前曾勉作猜測，一直不能完全心安。<sup>④</sup> 去年有幸讀到李學勤先生的論文，始悟原猜測不確。現在覺得較可能與西周南宮氏伐虎方，向成王、周公獻俘一事有關。有趣的是重新解讀這一畫像，發現漢代畫像述說的故事有時不必然也不全然符合其它可考的證據或一般認可的「歷史真像」。故事中的人物或時空背景雖有根源可稽，在流傳過程中卻可能經歷有意或無意的挪移變造而面目難辨。

- ① 邢義田，〈「豫讓刺趙襄子」或「秦王謀殺燕太子」？——山東鄒城南落陵村畫像的故事〉，《今塵集》（上海：中西書局，2019；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中西版下冊，頁 640-651，聯經版卷三，頁 203-217。
- ② 楊孝鴻，〈關於流散日本的漢代畫像石調查與研究〉，《中國美術研究》2019.1：4-10；又可參土居淑子，〈日本に所蔵される画像石の研究〉，1989 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課題，課題編號 01510039（<https://kaken.nii.ac.jp/ja/report/KAKENHI-PROJECT-01510039/015100391989jisseki/>，2023.08.14 檢索）。土居文僅見摘要，未曾讀到全文。其詳請參楊孝鴻文。此石在日本較早的著錄見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東京：佛書刊行會圖像部，1915），頁 87；附圖 303。關野貞，〈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学紀要》第 8 冊第 1 號，1916），頁 104；附圖 161，頁 95。
- ③ 2023 年 9 月 14 日承蒙初山明教授電傳轉下谷豐信先生調查發現羅振玉的第一次訪日記錄《扶桑兩月記》中記載 1901 年 12 月 20 日訪問上野公園的博物館（即現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經查羅振玉《扶桑兩月記》（收入鐘叔河、曾德明、楊雲輝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2016）辛丑冬十一月初十日，有云：「午後至上野公園博物館，人出三錢買游券……中有予所贈之漢畫石刻、晉碑、古盞、古陶尊在焉。」（頁 86）既云午後去上野的博物館，花錢買門票入內，從「中有予所贈之漢畫石刻、晉碑、古盞、古陶尊在焉」的記述語氣看，應曾親自見到他捐贈的文物。可見沂州畫像石在 1901 年年底前已入藏上野東京博物館。畫像石、碑、陶等皆笨重，不同於書畫和金石拓片。據羅振玉校補王懿榮《漢石存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雪堂叢刻本）卷下〈畫存〉最後一目云：「又一石有題字，後人刻，沂州出土，玉得之，贈該館」。可證沂州畫像石確實是其所贈。羅振玉基於什麼因緣，為何又如何將這些笨重的文物送到日本，如何捐贈給東京的帝室博物館，仍待研究。過去大家似較注意羅振玉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後大量出售中國古文物書畫到日本，較少人注意他在此之前的捐贈或出售。請參注 8。
- ④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18；上海：三聯書店，2020），三民版頁 174-179，三聯版頁 154-158。



沂州畫像石殘長 101.5 公分，寬 44.5 公分，明顯是山東地區東漢石室墓常見的墓門橫楣石，左端有一大型高浮雕的羊頭。羊頭下及右方有以豎刻線為底紋和陰線刻的人物。人物畫面部分已殘泐，幸好「周公」、「成王」、「南公」、「使者」、「門亭長」榜題大致完整。畫面佈局和山東漢墓中常見的周公輔成王圖有相似處，也有不同。



圖 1：沂州畫像石（2009.1.20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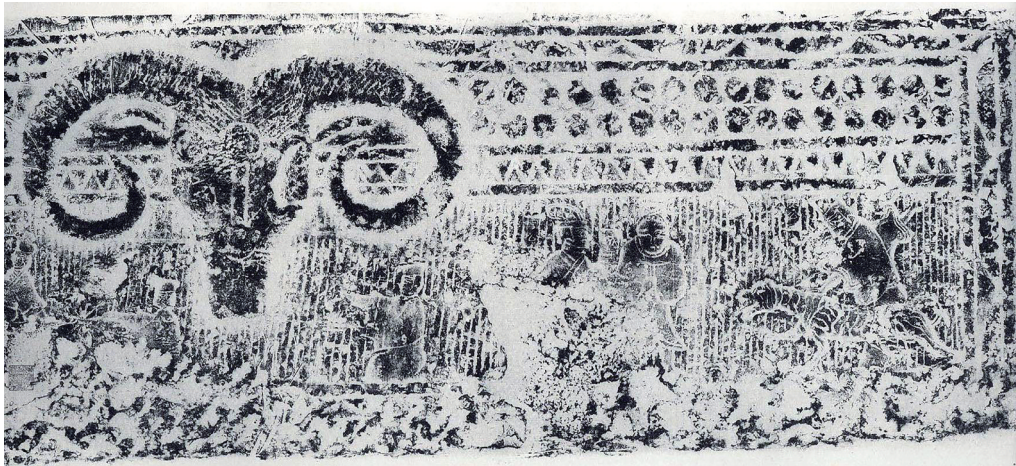


圖 2.1：傅惜華，《漢代畫象全集》二編（北京：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0-1951），圖 214



圖 2.2：前圖局部，自左至右榜題：周公、成王、南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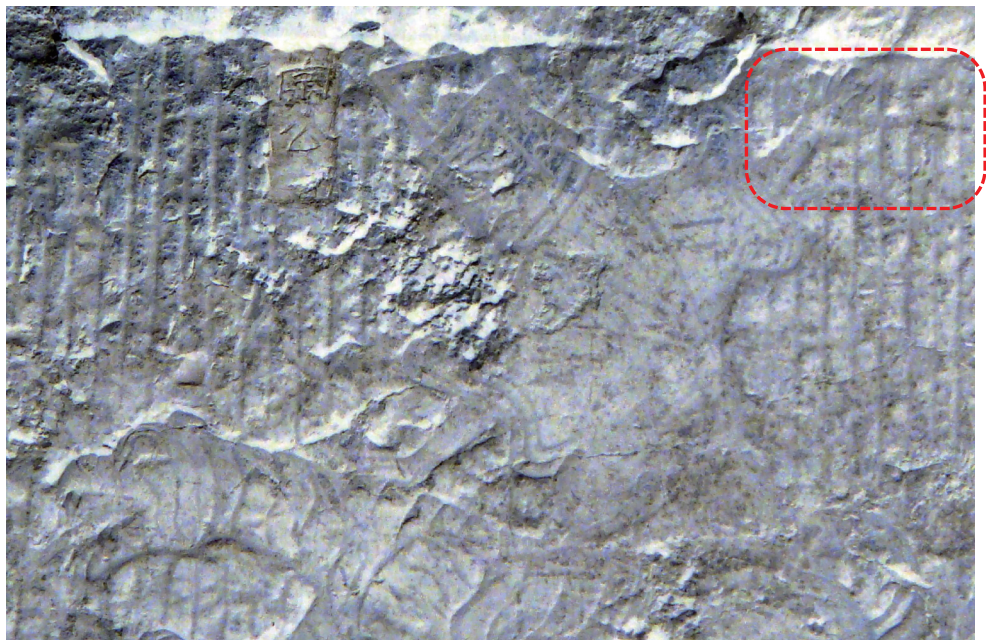


圖 2.3：原石照片局部反白，可見南公揚起的一手持有一鞭

我們先稍稍回顧一下周公輔成王圖。周公輔成王圖在山東的漢畫中有相當一致且格套化的畫面構成和佈局。成王身形較矮小，居中，正面朝前，頭戴冠；兩旁各有側面拱身相向的人物，其中一人或持華蓋（也有些不持），遮於成王的頭頂，有時更有明確的榜題「成王」、「周公」、「召公」而可確認畫像的內容（圖 3.1-3.3）。有時一無榜題，但由格套化的人物造型和佈局也可以認出是周公輔成王圖。這一畫像例子很多，久經論證，無須多說。<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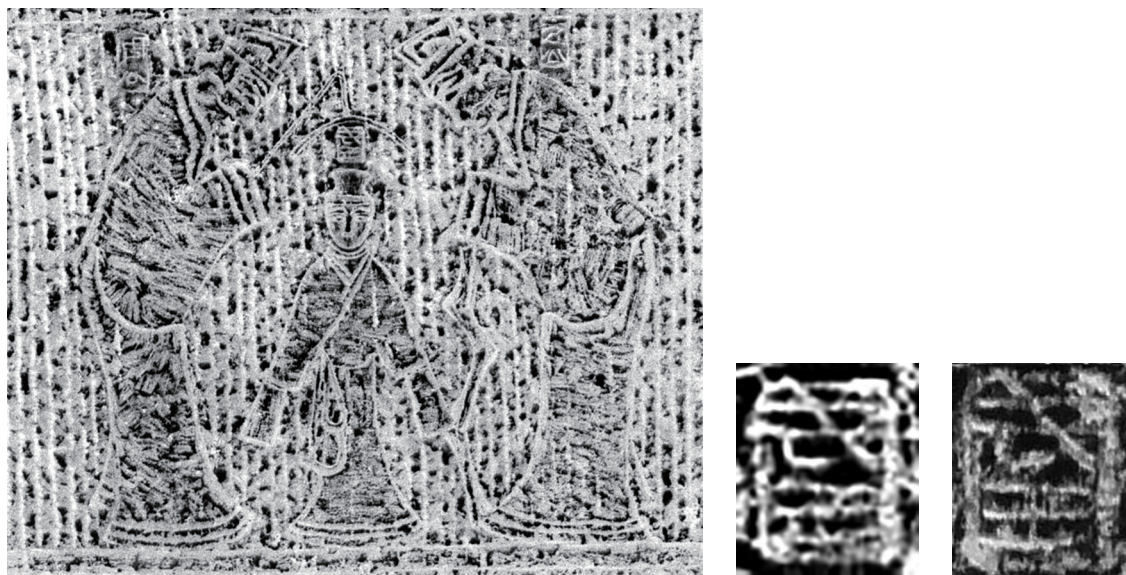


圖 3.1-3：「周公」、「召公」、「武<成>王」榜題畫像及「武<成>王」原石及拓本榜題  
(1998.9.3 作者攝於嘉祥武氏祠)

⑤ 唯嘉祥武氏祠所藏這方畫像（圖 3.1-3.3）榜題「成王」二字誤作「武王」，也有可能不是誤刻，而是工匠弄混成王



這件沂州畫像石，圖中一人正面朝前，榜題「成王」；其左側有一人戴冠，側身朝向成王，榜題「周公」（圖 4.1-4.3）。這些部分在佈局上和常見的周公輔成王圖相似，唯成王體型沒有較小，周公的頭冠也不同於常見的進賢冠。可能由於這些刻畫不合常例或格套，石工不能不特別加上「周公」、「成王」榜題以明確化人物的身份。這頗像山東西王母畫像有大體一致的造型格套，通常根本不須題榜，一看造型和佈局便能辨認。可是山東微山兩城鎮和滕縣西戶口出土的兩方西王母畫像造型有違常例，或在頭冠或頭飾上蹲一鳥而無戴勝，或雙耳有串式耳墜，嘴內虎齒，嘴上又有髭鬚。當時的石工為明確所刻人物身份，不得不刻上「西王母」或「田<西>王母」三字（圖 5.1-5.2、6.1-6.2），否則當時的觀者單看畫面，很可能疑惑她是不是西王母。<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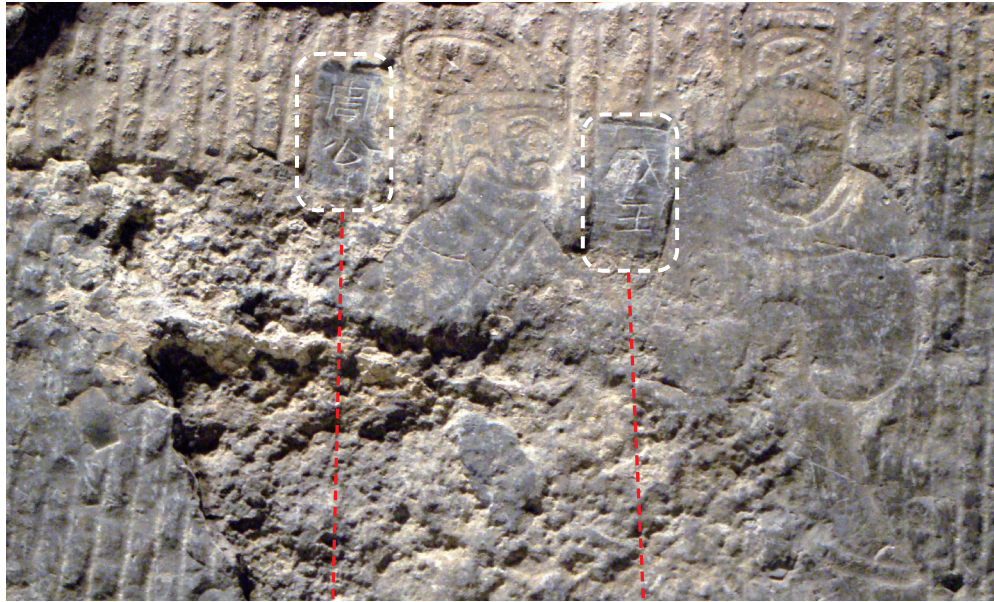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1-3：原石局部及榜題：周公、成王

和武王故事。成、武二字在漢代寫法判然有別，榜題「武」字無論從原石或拓本看，無疑即武字。漢代成、武二字字例可參胡孟強，〈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釋文訂補十三則〉，《簡帛》第 2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頁 161 所列字例表。

<sup>⑥</sup> 參馬漢國編，《微山漢畫像石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 2。為何西王母畫像會加榜題，相關討論參邢義田，〈漢代畫像內容與榜題的關係〉，收入邢義田，《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碑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85-87。



圖 5.1：微山兩城鎮「西王母」  
(作者藏拓局部)



圖 5.2：兩城鎮原石  
(2004.7.30 作者攝於微山文物管理所)



圖 6.1：滕縣西戶口「田<西>王母」  
(作者藏拓局部)



圖 6.2：西戶口原石  
(2004.7.28 作者攝於山東省博物館)

沂州畫像中成王右側的一人，其榜題傅惜華釋為「南公」。南字筆劃和石面泐痕相雜，較不易分辨。現在看來，傅惜華所釋正確。南公一手後揚並持有一鞭，另一手牽一頭虎紋刻畫清晰的老虎，側身朝左面對著成王（圖 2.2-2.3、7.1-7.2）。換言之，畫面形成一個成王居中，南公和周公在兩側的格局。在周公的左側還有跪著的一人，面朝左，伸手向前，榜題曰「使者」。再向左，另有一人，石殘，榜曰「門亭長」（圖 8.1-8.2、9.1-9.2）。其左又有一人，無榜或榜題殘失。其實這方畫像石殘去左半，左半應還有其他的畫面。以殘存的部分來說，如果沒有榜題，單從漢畫習見的周公輔成王圖而言，並不能肯定畫中的人物是周公和成王。因為成王身側怎會有人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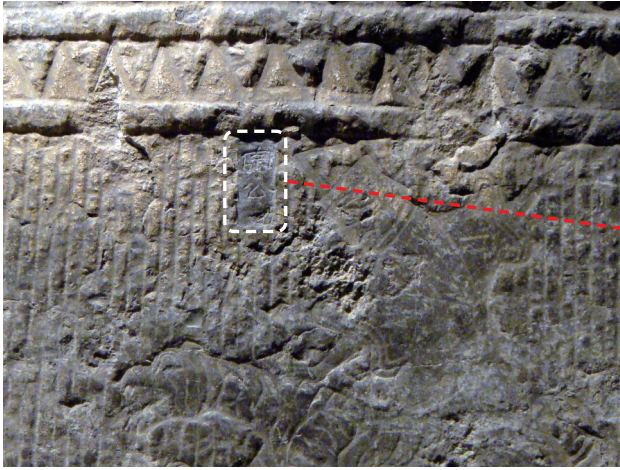


圖 7.1：原石局部及榜題南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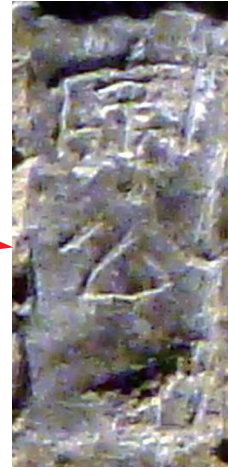


圖 7.2：榜題：南公



圖 8.1：原石局部及榜題：使者



圖 8.2：榜題：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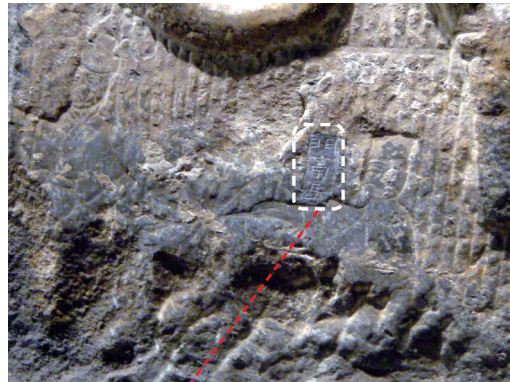


圖 9.1：原石局部及榜題：門亭長



圖 9.2：榜題：門亭長

正因為沂州畫像石的畫面既像又異於常見的周公輔成王圖，又無文獻可參照，畫像故事久久無人能解，不免令人疑心這一石是否可靠。例如羅振玉自己曾在《漢石存目》中說：「有題字，後人刻」，又在《海外貞珉錄》提到：「榜乃後刻。後半一羊首，甚巨。」<sup>⑦</sup>「後人刻」、「榜乃後刻」指榜題非原刻而為後人所補。此語出自一位金石

⑦ 羅振玉，《海外貞珉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雪堂叢刻本），頁二上。《漢石存目》參前注3。

大家，影響不小。從此幾乎不見有學者有興趣去研究這一畫像石，卻議論羅振玉在日本出售書畫文物的良莠真偽。<sup>⑧</sup>

羅振玉酷好金石古物，熟知山東畫像，對周公輔成王之類常見畫像的特徵瞭若指掌。他不評論沂州畫像石畫面之異，卻指榜題文字為後刻，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金石玩家偏好碑石文字甚於畫像，古董商為提高價值，常在真畫像石上補刻文字以吸引金石愛好者。沂州一石有高浮雕的羊頭和各種紋飾，雕造費工費錢。對古董商而言，要加值自然以僅僅補刻若干文字最為省費和討好。當時嗜金石者出入古董舖，稍不留神即為補刻文字所欺。羅振玉周遊各地，必訪古董舖，連遊日本也不例外。我們已無從知道他於何地購入沂州畫像石，於何時，又如何判定榜題為後刻，又決意贈送。無論如何，他校補王懿榮《漢石存目》，於序中聲明「偽刻不錄」。《存目》卷二〈畫存〉補錄的最後一件卻正是沂州畫像石，可見羅振玉並不認為這方畫像石為偽作，僅判斷文字為後刻。

說實在，我對沂州一石文字題刻原本也不無疑慮，多次參觀，曾再三察看原石榜題，殊感文字刻畫並沒有字體不符，或因後刻而與畫像刻鑿深淺新舊不諧的跡象，實不易從刻字本身定是非；或者說，我的經驗太有限，不足以憑刻字辨真偽。羅振玉說後刻，必有斟酌，不能等閒視之。唯傳統金石行家考訂真偽多依據長年鑑識經驗、眼光、文獻和題刻等等。凡傳世文獻無考，又無其他金石可參照的孤例，一方面因無可比對，容易遭疑，另一方面鑑識單憑經驗和眼光有時也會束手或走眼。

拜近年考古之賜，沂州畫像的故事淵源如今已見端倪，我以為應可不必再懷疑此石榜題為後刻。因為石上刻畫的故事雖不見於傳世文獻和其它金石，卻見於下文將談到的西周青銅器。這些帶銘青銅器或流藏海外，或在近二十多年內出土。百餘年前的古董商不論多高明，怎可能預知百多年後才出土的青銅器，先刻上「南公」、「周公」、「成王」這樣合轍的榜題，提早製造出一個「南公向成王、周公獻俘」的故事（詳下文）？羅振玉當年如果得見這些青銅器，又看出器銘和沂州畫像石可能的關係，我相信他的判斷應會不同。<sup>⑨</sup>

接著要問另一個問題：畫面中的人物「使者」、「門亭長」和「南公」、「周公」等是否相互有關？是否屬於涉及故事的同一個畫像單元？因為石殘，這一點變得不是那麼明確，不能不先釐清。首先，使者和門亭長常見於山東漢墓畫像。他們在畫面故事中又常是配合故事主人翁而出現。請大家留意畫面中使者和門亭長都面朝左，背對右

⑧ 羅振玉在日本出售書畫文物的良莠真偽，久已引起學者注意。以下幾篇都曾略及，例如洪再新，〈自立於國際藝術市場上的「遺老」——試論羅振玉流亡京都期間的學術建樹與藝術交易〉，《新美術》2010.1：14-25；王正華，〈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器物」、「器物學」在民國初年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2011）：277-312，關於羅振玉出售的書畫類，可參蘇浩、邱吉，〈1911年羅振玉舊藏書畫售入日本始末及其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3：117-131。此文談1911年以後的交易為主。

⑨ 這種情形有點像歐美及日本所收藏的中國中古石棺床，曾長期因無考古出土品可參照，真偽難定而被冷落。近數十年來北朝及隋唐墓陸續出土不少石棺床，相關文字出土資料也大增而被重新肯定，引發研究熱潮。參林聖智，〈北朝晚期漢地粟特人葬具與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齊安陽石棺床為主的考察〉，《中央研究



側的周公、成王及南公。按照漢代畫像安排同一故事單元人物朝向的通例（可參本文圖 13.1 左右兩單元），相背的多半分屬不同的單元。因此我相信他們不是周公和成王的配角，較可能從屬於更左側的另一個故事單元。

其次，由於巨型浮雕羊頭通常出現在山東漢墓墓門橫楣石中央，可以確知沂州畫像石左半已殘失。2010 年我曾在濟南閔子騫祠見到不少散置在院落草叢間，徵集自濟南附近，以巨型高浮雕羊頭為飾的漢代墓門橫楣石；凡完整未殘者，羊頭必在橫楣石中央（圖 10.1-10.3）。<sup>10</sup> 由此可知沂州這一石殘缺左半，我們也就無從討論和使者、門亭長相關的左側畫面。幸好就分析畫像寓意而言，由於左右兩半在佈局上分屬不同的畫像單元，我們可以安心地將右半的周公、成王和南公的部分視為一個獨立的單元，解讀其寓意，不必顧慮左半。



圖 10.1-3：濟南閔子騫祠藏墓門橫楣石（2010.7.1 作者攝）

如果以上的分析可以成立，則可確認周公、成王和牽虎的南公應屬同一個寓意主題，表現同一個故事。可是主題為何？南公為何人？又為何牽虎？不易揣測。我曾一度猜想是否是《史記》和《漢書》提到的楚南公或南公？《史記·項羽本紀》謂：「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3（2010）：513-596；林聖智，〈北周康業墓圍屏石棺牀研究〉，收入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237-263。

<sup>10</sup> 山東地區漢墓門橫楣石羊頭居中的例子還有很多，可參例如《中國畫像石全集》（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第 3 冊，圖 179-181。在山東省博物館也曾見門楣石有三羊頭分居左中右或兩羊頭分居左右的例子。但從佈局和門楣石長度看，沂州一石原應僅刻有一個居中的羊頭。最新的例子見 2018 年底濟南濟陽區三官廟出土漢墓。該墓各室石門橫楣例以高浮雕居中羊頭為飾，羊頭共達十六件之多。這是明確出土品之例。參 <https://kknews.cc/culture/qx44rro.html>（2020.07.14，2024.05.12 檢索）。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條著錄有《南公》三十一篇，並謂乃「六國時」著作。但這位六國時的南公或楚南公和周公、成王有何關係？為何又有老虎出現在同一個畫面中？無法解釋，令我不能心安。又因傅惜華所釋「南」字筆畫較難辨釋，曾臆想「南」會不會是隸書形近的「宗」或「泉」字（圖 7.2）？<sup>11</sup> 現在知道這些猜想都該放棄。

## 二、從近年出土西周青銅器銘重讀沂州畫像故事

放棄的原因在於去年偶然讀到李學勤先生談西周金文中南宮氏的論文——〈試說南公與南宮氏〉。近日又因好友陳昭容指點而查閱了許多相關的研究。<sup>12</sup> 讀後頓覺多年疑惑霎時雲消霧散。南宮氏無疑可以省稱為南公。畫像中的南公應是指周文王、武王時的重臣，以南宮括為祖的南宮氏。南宮氏代代輔佐西周王室，功勳顯赫，最著名的南宮括見於《尚書·君奭》，也見於 2019 年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169 號墓出土的嬭加編鐘等多件青銅器銘。西周成王時，南宮括的族人因功曾被封到江漢地區建立侯國。<sup>13</sup>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安陸（今湖北孝感）曾出土所謂的「安州六器」，著錄見趙明誠《金石錄》和王黼《博古圖錄》等書。六器中的中方鼎銘提到「惟王命南宮伐叛虎方之年」，2000 年山西曲沃北趙晉侯燮父墓出土的敔，有銘云：「惟十又二月王命南宮伐虎方」。李先生參證諸器，推定伐虎方之年為昭王十八年。此說多為學者所接受。<sup>14</sup> 又據李先生研究，兩器中的南宮有可能是周昭王時南宮氏第三代的南宮孟，孟曾受命伐虎方，立下戰功，因而造器。此外，曹錦炎先生指出日本某私人收藏的敔或壺有「王命南宮伐豺（豺）方之年」之銘。<sup>15</sup> 有學者認為虎方和豺方相鄰

<sup>11</sup>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三聯版頁 154-158。

<sup>12</sup> 李學勤，〈試說南公與南宮氏〉，《出土文獻》第 6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6-10，又見李學勤，〈論敔與昭王南征〉，《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紀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76-80。另可參黃鳳春、胡剛，〈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論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2014.2：50-55；孫慶偉，〈從新出敔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文物》2007.1：64-68；韓巍，〈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98-118 或韓巍，〈青銅器與周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 284-310；陳昭容，〈曾侯夫人嬭加的生命軌跡——從隨州棗樹林 M169 隨仲嬭加墓陪葬銅器談起〉，《古今論衡》38（2022）：81-98。

<sup>13</sup> 南宮氏自周初至春秋幾乎代代為周王朝重臣，詳見前引韓巍，〈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一文，又參前引陳昭容，〈曾侯夫人嬭加的生命軌跡——從隨州棗樹林 M169 隨仲嬭加墓陪葬銅器談起〉，頁 88。

<sup>14</sup> 不少學者同意李說。例如：孫慶偉，〈從新出敔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頁 64-68；曹錦炎，〈新見敔銘文及其相關問題〉，《半部學術史，一位李先生：李學勤先生學術成就與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頁 428-434；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出土文獻》第 9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41-53；吳鎮鋒，〈敔壺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501>，2019.12.11）；黃錦前，〈敔壺、豺方與江淮的開發〉，《安徽史學》2021.5：131-147。

<sup>15</sup> 曹錦炎前引文〈新見敔銘文及其相關問題〉，頁 428-434。



近，先後或同時為南宮所征服。<sup>16</sup>也有學者據青銅器銘，按年月和方國地望，鋪排出昭王南征的路線。南宮率領先遣軍，所伐方國多在昭王南征的路線上。<sup>17</sup>

李學勤先生的相關論文發於 1997、2007 和 2015 年。劉敦愿先生早在 1985 年已指出安州中方鼎和周公伐虎方的關係，更認為《孟子·滕文公下》所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云云，被驅而遠之的虎、豹、犀、象並不是真的動物而是以此為圖騰的方國。虎即虎方，是商周之際江漢一帶不小的勢力。<sup>18</sup>其說頗可和近二十多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相呼應。總之前賢所論各有偏重，但沒有人提到這方沂州畫像石。以上是目前所能找到，可以較好解讀這方畫像石故事的材料。以下試提一解，就教於大雅方家。

沂州畫像石從畫面來看，南公牽虎朝向成王和周公，不是真的牽了一頭老虎，而是以虎象徵被俘或歸順的虎方。南公受命征虎方，戰勝並收服了敵人，進而向成王和周公獻俘告捷。南公揚鞭牽虎意味著虎方受制，聽命歸順。漢畫像石和壁畫中這類以具體之物喻指抽象概念的手法比比皆是，例如：以桂喻貴、以鹿喻祿、以猴喻侯、以雀喻爵、以羊喻祥、以魚喻餘。虎方乃一方國，如何用圖畫呈現一個被征服的方國呢？對漢代畫工石匠而言，相當自然的手法就是利用一頭被人持鞭牽繫著的老虎象徵被征服和歸順的虎方。再者，自商周以來就有獻俘告捷的儀式，獻俘告捷的畫面也是漢代胡漢戰爭圖石刻或壁畫裡常見的組成部分。工匠利用胡漢戰爭圖裡現成的牽繫胡虜（圖 11）和周公輔成王圖的格套而稍變，以牽虎取代牽繫胡虜，以南公取代召公，就可簡便地創構出成王居中，周公和南公在兩側的「南公向成王和周公獻虎方之俘」圖。



圖 11：山東漢畫像中常見牽繫胡虜的獻俘場面，嘉祥宋山第二批畫像第二石局部  
(2016.8.17 作者攝於山東省博物館)

- <sup>16</sup> 黃錦前前引文〈穀壺、豺方與江淮的開發〉，頁 131。
- <sup>17</sup> 繼唐蘭鋪排南征之後，續有例如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初刊於 1997，後收入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孫慶偉，〈從新出穀壺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頁 64-68；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頁 41-53；朱鳳瀚，〈新見西周金文二篇讀後〉，《青銅器與金文》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39-48。
- <sup>18</sup> 劉敦愿，〈雲夢澤與商周之際的民族遷徙〉，《江漢考古》1985.2：47-57，後收入劉敦愿，《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 414-433；另參劉敦愿，〈含義複雜的中國古代虎崇拜〉，收入《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頁 161-178。以上兩文又見劉敦愿，《劉敦愿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可是沂州畫像榜題為「成王」和「周公」，不是西周青銅器銘文所說的昭王；榜題「南公」據李學勤之說也應該是指武王、成王時的南宮括而非其後人南宮孟。人物和時代都不符，這要如何解釋？前文曾稍稍提及故事流傳中的挪移變造，這裡必須進一步說明。

首先，古代故事在流傳中常常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有意或無意地錯置或挪移了人、時、地。這種傳聞異辭的現象在古代文獻中常見。<sup>19</sup> 漢墓和祠堂的石刻或壁畫也是如此，其委造者和負責刻畫的工匠並不像司馬遷或今天的學者那樣在意故事的主人翁和時空準確性，時空、人物混淆或挪移的例證俯拾即是。單以我曾討論過的漢墓畫像來說，「七女為父報仇」的故事即為一例。<sup>20</sup> 內蒙古和林格爾小板申漢墓壁畫榜題標明七女報仇的對象是「長安令」，河南安陽曹操墓所出相同畫像卻題刻作「咸陽令」。咸陽、長安之異一則意味著故事發生的地點挪移，也意味著時代或在秦或在漢。長安令和咸陽令是不是同一人？也成了問題。

再如藺相如完璧歸趙和荊軻刺秦王故事中的秦王，本應為秦昭襄王和秦王政二人，漢畫像卻有混同兩秦王為一人之嫌。在藺相如的故事裡，昭襄王曾將藺相如奉上的玉璧交給美人傳觀，藺相如詎回，持璧作勢欲碎之於柱。由故事可知玉璧必會出現在昭襄王和藺相如的故事畫面裡。山東嘉祥武氏祠荊軻刺秦王畫像中的秦王，殘榜作「[秦王]也」，手裡拿著和藺相如手中幾乎一樣的玉璧（圖 12.1-12.2）。遭刺的如真是秦王政，手裡怎會有玉璧？持璧的秦王到底是那一位呢？陝北神木大保當漢墓石刻則將藺相如完璧歸趙和荊軻刺秦王二事安排在左右連續的畫面中，兩畫面都有形式相同的立柱，只是左側畫面多了一柄刺穿立柱的匕首；兩位秦王的衣冠造型一模一樣，只是一跪坐，一正在逃跑而已（圖 13.1-13.4）。這是無視於故事的真正主人翁而含糊呈現同一位秦王的兩個故事嗎？

漢代的工匠有時為了特定目的，利用榜題和畫面安排，甚至刻意模糊化時空和置換人物。例如所謂的泗水撈鼎圖，撈鼎地點因無榜題而無法確知在泗水，畫面呈現有時則更像在某一建築之旁或其下（圖 14.1-14.2）。傳說中撈鼎的主角秦始皇被刻意模糊成「大王」，甚至被刻畫成了期待騎龍升仙的墓主。<sup>21</sup>

<sup>19</sup> 近見張忠燁先生甚至舉證傳世文獻和出土簡《奏讞書》案例中也有同一故事的主人翁不斷改變的例子。請參張忠燁，〈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性質：以所謂的「春秋案例」為中心〉，《秦漢律令法系研究續編》（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 63-69。

<sup>20</sup> 邢義田，〈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為父報仇」漢畫故事為例〉，《畫為心聲》，頁 92-137。

<sup>21</sup> 詳參邢義田，〈漢畫解讀方法試探——以「撈鼎圖」為例〉，《畫為心聲》，頁 398-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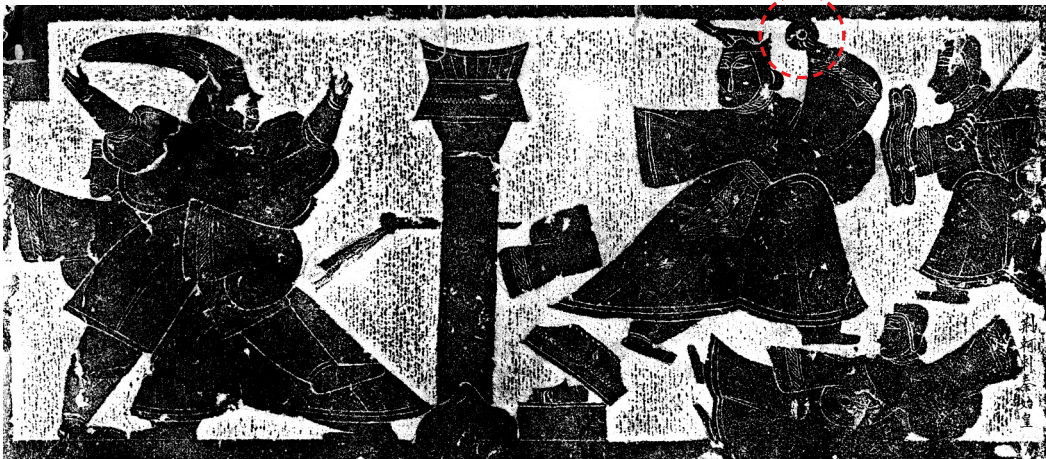


圖 12.1-2：武氏祠兩幅荆軻刺秦王圖中秦王手中持璧（史語所藏拓本局部）



圖 13.1：神木大保當漢墓石刻局部：  
左端荆軻刺秦王圖佔全部畫面三分之二，右端藺相如完璧歸趙圖佔畫面三分之一



圖 13.2：前圖右側局部，藺相如手中持璧  
（《中國畫像石全集》第 5 冊，圖 225）





圖 13.3：武氏祠，榜題：「秦王」、「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史語所藏拓本局部）



圖 13.4：陳志農摹本（《山東漢畫像石匯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頁 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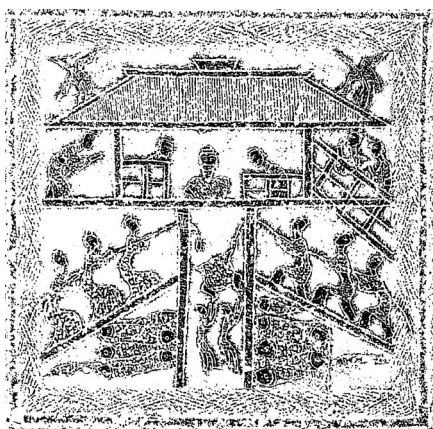


圖 14.1：山東微山出土石槨畫像局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 2 冊，圖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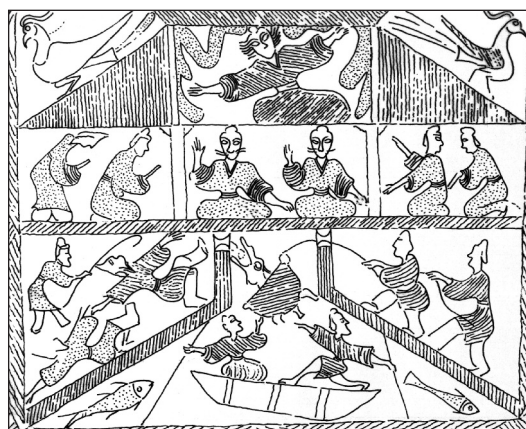


圖 14.2：山東鄒城出土石槨畫像局部（今藏鄒城市博物館，作者線描圖）

再者，中國古史上常見箭垛式的英雄。許多發生在幾代人或不同人身上的故事可以被堆疊或集中在少數箭垛式或具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文、武、周公像桀、紂一樣，都是漢代人們較熟悉而且代表不同典型的箭垛式人物。南宮孟征虎方、豺方有功，名氣卻遠不如《尚書》中赫赫有名的先祖南宮括；南征不返的周昭王，知名的程度也不如文王、武王和漢畫中常見的周公和成王。在上千年的流傳中，南宮孟的事功很可能就有意無意地被挪移到了南宮括的身上，時間也從昭王移置到周公和成王的時代。這樣的移置發生在何時？是一步步或突然發生？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目前都一無線索。

因此我們是否也該反過來思考：畫像中南公牽繫的老虎，可能真是一頭老虎。幾乎不識經典或文字的漢代石匠畫工，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所謂南宮氏伐虎方的故事，怎



會以虎去象徵虎方呢？漢代畫像中常見勇士搏虎，甚至有羽人手持一鞭，以虎為座騎（圖 15.1-15.2）。<sup>22</sup>可見在漢代人的心目中，虎可以被制服，可以為人或神所用。在迄今可考的漢代傳說中有一位懂法術能伏虎的東海黃公，最後因酗酒，法術失靈而死於虎口。<sup>23</sup>這些故事中的虎都是真虎，不是象徵。以上這些畫像和故事彼此或許無關，但是否和周公、成王有關呢？可惜我們現在也沒線索進一步去研究。



圖 15.1：搏虎畫像（1992.10.17 作者攝於商丘博物館）



圖 15.2：持鞭騎虎羽人畫像（1992.10.17 作者攝於商丘博物館）

我們還必須一問：這樣一個變形失真的故事為何會出現在墓門的門楣上？我相信虎方應曾是江漢一帶，淮水以西令周人感到不安的敵對勢力，不能不出兵征討。傳世和出土西周青銅器銘因而屢屢提到伐虎方，也提到伐豺方。豺虎都是凶殘致命的動物。《詩經·小雅·巷伯》謂：「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在後世的記憶中，虎方、豺方被簡化合一，化為一種凶惡，具威脅或致命性力量的象徵。在墓門門楣上出現巨大浮雕的羊頭和陰刻的老虎，一方面意味著墓門可抵擋來犯的凶惡勢力，保障墓門內的平安吉祥。另一方面，致命的猛虎一旦被制服，可能隨即轉換了角色，由侵害者變成

<sup>22</sup> 更多例子可參閱根齊等編著，《商丘漢畫像石》（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2）。

<sup>23</sup> 東海黃公的故事見張衡《西京賦》和《西京雜記》卷三。詳參邢義田，《東漢的方士與求仙風氣——肥致碑讀記》，《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71-572。

了強而有力的保護者。這和漢世建築門扉或墓門常藉刻畫老虎或其它神靈異獸以避邪驅凶，用意應無二致。<sup>24</sup>

漢代畫像石近百年來出土已不算少，為何沂州畫像石的題材迄今無它例可考？我們不知未來會不會有新的相關畫像或簡帛文獻出土，目前僅能就已知者作一些推測，以下所說都必會隨新發現而修正。南公獻虎於成王和周公這一題材在漢代應並不流行，畫工石匠沒有現成的粉本或圖譜可用，其刻畫或許是應墓主或其家人的要求，稍變既有的圖譜而另行創製。這位墓主或有較獨特的偏愛，或有家學，知道某些漢世已少有人知的周公故事。這種自創一格，不落俗套的墓室圖飾選擇，有點像東漢末大儒趙岐生前造墓，自作主張「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後漢書·趙岐傳》）。也類似東漢大儒周磐臨終，指示兒子寫《堯典》一篇，刀筆各一，置棺前，以示不忘聖道（《後漢書·周磐傳》）。沂州畫像的墓主或曾有特別的指示吧。

另一種推測是南公獻俘於成王和周公的故事原本曾見於漢世某些著作，或在民間口耳相傳而為工匠所知，漢代以後才完全失去了蹤影。以前我曾指出漢代應流傳有許多和周公、孔子、老子等人相關卻失傳於後世的故事。<sup>25</sup> 周公和孔子在許多故事和畫像裡都是關鍵人物。故事中的其他相關人物可有出入，可多可少，但關鍵人物不變。在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中，另有召公和幼小的成王，攝政或稱王的周公無疑居於關鍵。這篇小文談南宮氏伐虎方而後獻俘於成王、周公，周公仍是關鍵人物，因此稱它為另一個周公故事。

漢代儒生頗多相信周公曾攝政稱王，乃制禮作樂的先聖，孔子夢見周公，乃繼承周公禮樂的後聖。漢代有周公廟，孔子及弟子畫像附屬於周公廟，又漢人習慣並稱周、孔而非孔、周，周公在漢世的地位明顯高於孔子。儘管周公的地位很高，故事很多，漢儒關注的焦點卻在於周公是否曾稱王？能否依循《周官》或《周禮》帶來太平盛世？<sup>26</sup> 南宮氏伐虎方而後獻俘之類的事情可能因落在關注焦點之外，較少人提及而被遺忘，不僅不見於秦漢傳世和出土簡帛文獻，漢墓石刻和壁畫中也幾無其它痕跡。魏晉南北朝以後周公地位下降，於唐代終成孔子獨大之局，不再並稱周孔，直到近世。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制禮作樂和輔佐成王等少數周公故事，其它漢世已少人知的故事，益發不會有人留心而歸於完全隱沒。幸好近年有金文專家串連北宋著錄的安州六器、日本所藏敔壺以及近二十多年山西和湖北陸續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探明器銘所涉的人物和時代，南宮氏伐虎方一事才得稍稍浮出水面，而沂州漢畫像石則使我們有緣一窺這個故事在西周以後千年，挪移變形的一絲痕跡。

<sup>24</sup> 例如《論衡·亂龍》：「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刻畫畫象，冀以禦凶。」

<sup>25</sup> 參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

<sup>26</sup> 關於漢儒對周公是否稱王和《周官》的關注請參邢義田，《秦漢皇帝與「聖人」》，《天下一家》，頁 50-83。



### 三、一點反思：

## 探索歷史真像或挖掘流動的歷史記憶？

痕跡難識，意義卻不小。因為對照相隔上千年的沂州漢畫像和西周器銘，我們不得不反思上一世紀「科學史學」以「求真」為歷史學科任務之說。

簡單來說，古人或藉口傳，或藉文字，或藉圖像傳遞信息，形成歷史記憶。信息和記憶明顯會隨人、隨時、隨地而增添、消亡、扭曲變形，終致模糊了故事的「原形」或「真像」。千百年後想要還原所謂的歷史真像，真像可得嗎？青銅器銘反映的就是真像嗎？難道不是造器者依主觀意志而刻意留下的印記？其中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吹噓或隱匿？同理，漢代畫像折射的也是主觀選擇後的某些故事或記憶，不必然是歷史的真實。「歷史真像」隨時空和記憶而流動，客觀真像不易尋覓和認定。相對而言，今人較能致力的不外乎在可能的範圍內，利用越來越多的出土材料，辨識和勾連已知的蛛絲馬跡，一步步去追索扭曲變形的軌跡和意義。我相信這比窮追原形或真像可行，也較可能帶來更多的啓示。因為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記憶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扭曲變形的過程，理解過程背後的動力和因素，這本身即極具價值和意義。因為在歷史過程中，發生作用和影響的往往不必然是所謂的事實或真像，而是變形後，為某一時一地多數人普遍接受或相信的說法。<sup>27</sup> 如果小文對沂州畫像故事的推測不無可取，它也許正是一個可以印證千年之變的例子，唯其千年之中如何變化？背後的動力和因素為何？仍然如謎，有待今後利用更多的材料去思考和探索。

後記：小文寫作過程中多承好友陳昭容提示金文材料，鄭岩提醒漢畫中常有搏虎畫面以及有劉敦愿先生的論文可參，賀西林和馬怡敏銳地指出不少疑點，學棣高震寰和石昇烜則分別提出不同角度的思考，好友韋山明轉示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前主任谷豐信先生對博物館收藏該石來歷的說明及看法，後又承谷豐信先生來信指教，使我有機會重新思考並修訂原稿，謹此申謝。唯修改後仍然存在的錯誤，概由作者自負。

(2023.8.3/2024.1.10/2024.5.6再訂)

<sup>27</sup> 例如燕太子丹是否曾逃過秦王政的謀殺在故事流傳的版本中，即有不同的結局，不同的版本都有人相信而引發不同的議論。請參前注1引邢義田，〈「豫讓刺趙襄子」或「秦王謀殺燕太子」？——山東鄒城南落陵村畫像的故事〉，中西版下冊，頁646-649，聯經版卷三，頁212-215。